

人類學的中國世紀?¹

彭可

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

摘要 十年前，弗里德曼曾經預言“社會人類學中國階段”的到來，但由於無法在中國大陸做田野，弗里德曼所言的“中國階段”事實上從未真正實現。只有到了現今，中國人類學才像弗里德曼暗示的那樣開始出現某些實質性突破。中國作為主流民族志區域有望為人類學提供大批基礎性的新議題，以中國對研究對象的人類學擁有獨特機會以對社會和文化人類學學科做出持久貢獻。但要真正實現這一可能性，必須借助於來自中心的人類學家與中國本土的人類學家進行平等、持續的討論，後者則只有通過參與這些討論，才能最終在一般化的人類學辯論上有機會被接納為平等的對話者。

一 研究中國的人類學之發展

1998年，或確切點說十年以前，我在北京大學做了一次演講，旨在呼籲人類學在中國應該更加國際化。² 我在那次演講中總結說，國際化決不止於在中國境外從事人類學家的工作。在中國的人類學家應該通過研究中國疆土以外的社會來拓寬他們的領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做出對那些並非專攻中國的人類學家來說有意義的成果。相比之下，今天要演講的文章則關注與中國人的人類學 (Chinese Anthropology) 相對應的群體以及他們最自然而然的對話者，即中國的國際人類學 (international anthropology of China)³。本文討論這一迅速發展領域的趨勢、問題及預示，同時



希望能繼續98年演講的核心關懷，有助於人類學和社會學在中國內 (IN China) 的討論。

幾十年前，莫瑞斯·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在他1962年馬林諾夫斯基講座中預言了“社會人類學之中國階段”的到來。⁴ 在講座中，弗里德曼對中國階段的特殊含義闡述得相當含糊。中國人類學 (the anthropology of China) 無疑在隨後的年歲裏發展壯大，但我相信，只有到了現今，中國人類學才像弗里德曼暗示的那樣準備好了在重要性方面的實質性突破。不過，我需得承認這與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們 (China Anthropologists) 的努力不大，而是與中國作為國際力量崛起相關。人類學家突然間像其他社會科學家一樣，第一次自覺而又自信地在國際舞臺中心尋找位置，正如日本在二戰前不得不面對西方核心以外的社會一樣。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人類學擁有獨特機會以對社會和文化人類學學科做出持久貢獻。像中國本身，研究中國的人類學由來已久。最早的田野作業可追溯到20世紀之交漢學家的研究。隨著1911年帝國的隕落，這批漢學家認定革命後的中國對於理解中國文化並無關聯，大多轉向文本研究。在1920年代特別是1930年代，包括幾位知名人士在內的國外人類學家，無疑對中國感興趣，他們在中國花時間教學、學習漢語，有時候甚至親自從事田野工作。然而，在一個捲入軍閥混戰、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的國家從事田野工作，其實際困難可想而知；最終，只有少數幾名外國人或受過國外訓練的中國人在這一時期發表了第一手田野資料。奇怪的是，一批美籍為主的人類學家，只到共產黨1949年勝利前夕，才開始在中國做田野，這對於將中國建成一個合適的民族志區域來說，太遲也太單薄了。在中國本土，人類學和社會學已有不錯的開始，但是除了鳳毛麟角以外，絕大多數作品很自然地以中文發表，並且置身於國際人類學主流之外。

共產黨勝利後，完全禁止外國研究者進入中國，與此同時，



無本土經驗的人類學研究與其他大多數社會科學一起受壓制。中國的人類學家要麼放棄一起工作，要麼被派去從事中國民族識別的國家工程，在這一過程中變成“民族學家”。逐漸地，在中國的人類界和外國的人類學界，學者的反差出現了。在中國，當人類學在毛澤東時代身處黑暗之時，西方（尤其是美國）在研究中國方面卻取得了長足進步，特別是繼中蘇分裂、中國在1960年代早期研製出原子彈從而徹底改變了1950年代冷戰的雙邊格局以來。

中國人類學的復興是嵌置在以上大歷史背景下的。共產主義勝利前後，一批中國籍人類學家離開中國（或僅寄居國外），正是這些人首次在國外人類學系和社會學系開展了中國研究。但他們後來在美國既缺少制度支持，又缺少資金支援。在隨後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裏，亞瑟 (Arthur) 和沃爾夫 (Margery Wolf)，施堅雅 (William Skinner) 和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他們有意識地著手於想把中國建成專業的人類學調查基地。這些學者的研究規範了學科秩序，確立了人類學家闡述中國時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更重要的是，他們訓練出一整代學者，堅持要求他們既懂人類學，又要會寫會說漢語。這是史上第一次，母語非中文的研究者隻身從事中國田野變得普遍。不像其他社會科學那樣將共和國界定為研究對象，施堅雅、弗里德曼，以及亞瑟和沃爾夫這幫人認為田野作業的主要區域是台灣和香港。在他們看來，人類學嚴重依賴長期田野工作，因此需要集中於這些大陸以外的中國地區 (Chinas-away-from-China)。

隨後是一段總體上出色的“常規科學 (normal science)”（庫恩意義上）時期。然而，常規性是以某種褊狹 (insularity) 為代價的。雖然這些人類學家帶到中國的問題整體上屬於一般人類學問題 (general anthropological ones)⁵，他們帶回的答案卻往往在學科內部得不到應有的回應。雖然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人數在主



流系所內穩步增長，中國人類學卻只在大範圍理論和比較性論辯方面擁有有限影響。一部分原因在於人類學理論與中國現實間的脫節，最有名的例子譬如，非洲親屬關係模式和中國親屬制度間的矛盾。如理查·法登 (Richard Fardon) 開創性的作品《本土化策略》 (Localizing Strategies) 所示，人類學並不是通常認為的那樣是一個統一的學科 (Unified discipline)，而是，世界不同地區擁有截然不同的民族志傳統，每一傳統都有自身獨特的方法、概念、關注點和爭論點。⁶ 人類學作為學術調查領域的連續性和一致性，是由那些特定的概念和思想所支撐的，這些概念和思想主要來自最早的民族志區域。它們在根本上受到西方殖民主義或者說居民移置的影響（主要在非洲、澳大利亞、東南亞以及北美印第安人，隨後是南亞、中東以及拉丁美洲）。東亞（中國、日本、朝鮮）不曾完全淪為殖民地（作為殖民者的日本例外），在這些地方人類學家進入得就很遲，結果發現自己除了借用和適應已有的概念、進路和理論外，幾乎難以對學科主流有什麼新貢獻。細數的話，僅有兩個一般概念 (general concepts) 來自中國。通過社會學家⁷ 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面子 (face)” 一詞現在與 “榮譽”、 “地位” 一樣常用。⁸ 近來， “關係 (personal relationship, guanxi)” 一詞被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廣泛使用，似乎逐漸滲透到其他領域的討論之中。

還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新一代專職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大多僅限於內部討論。在1962年的講座裏，弗里德曼將新一波研究中國的人類學視為積極參與複雜的中國社會及其文明化進程的先驅。換句話說，中國使得人類學家擺脫了對原初社會和小群體的全然依賴。弗里德曼看來，無法在中國大陸做田野迫使人類學家遠離學科傳統。然而，結果正相反，在我看來這就是弗里德曼所言 “中國階段” 從未實現的主要原因。由於沒法在大陸做田野，新一輩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所討論的文化主要來自人為構



造的“中國”——這是從台灣和香港複雜而又迅速現代化的社會中切割出親屬關係、市場、宗教或民族性 (ethnicity) 等大多數傳統部件，然後狹隘地拼接成的“中國”。這種現象直到1970年代中後期對多數人類學來說都非常普遍，就中國的情況看，時空距離使得調查對象（1949年前的大陸）和田野地點間的不一致性相當突出。

一定程度的褊狹可通過建立相關新領域來排除，1980年代和1990年代，港台人類學家確實轉而研究更為廣泛的議題，它對研究此時此地所發生之事來說更為合適。不過更大的問題在於，當機會最終在1970年代末期到來時，基於港台的研究使人類學家在研究大陸時準備不足，至少我這麼認為。雖有一批學術生涯始於港台的學者積極轉到內地開展田野項目，但對許多人來說，研究新中國不是件容易事。當中國文化如他們所知的那樣已被竭力壓制幾十年後，社會上瀰漫著失落、遺憾甚至有時輕視的情緒，田野工作因此經常變得難以安排與實施。同時，在純研究領域，研究者很難做到帶著開放的心態進入中國田野地點，研究或明或暗地圍繞著中國作為整體或共產黨三十年執政影響的比較問題。我們如何解釋中國（農村）範圍內特殊社會制度的多樣性和一致性（例如親屬團體，婚姻模式或宗教崇拜）？新中國的哪些歷史事件能解釋與港台或傳統中國的巨大不同？在1949年這一分水嶺前後，共產黨宣傳中努力隱藏的潛在相似性與一致性是什麼？這些問題無疑很重要，但卻缺乏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的關注。結果，只有那些堅持許多年的人會及時找到針對中國大陸的問題，並收穫了可與他們早期工作相媲美的研究成果。

當然，年輕的博士研究生在田野工作初始階段，對這些問題毫無抵抗能力。一些人身列探討人類學最後疆界的少數，同時又面臨著在其中一個地方安排長期且深入田野調查的現實困難，這使得他們（包括最近的作者）在有些情況下為掃視更廣泛的疆



士而犧牲了民族志的深度。而另一些人則成功地在一個特定地點進行長期研究，往往做出有相當深入民族志深度的作品。不過，所有這些年輕的學者對於那些更早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這些人往往是他們的老師）來說擁有重大優勢，即：他們的工作不受來自早期研究的期望所礙。結果，他們成功建立了一套事實、分析和框架的基準，這是以共和國而不是老一輩所瞭解的抽象的“中國”為基礎的。

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境外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成指數增長。新一代博士生是一個健全的混合體，包括：母語非中文者、大陸人、台灣人和香港人、第一代東南亞華人或其後代、北美美人以及歐洲人。中國的田野工作日漸容易安排，許多人類學家目前已經在田野地點、政府部門以及中國社會科學家間建立了廣泛聯繫。中國的人類學田野工作，以其深入度、持久性及品質足以匹敵其他民族志地區中最優秀的；研究者也能深入中國境內，探討那些十或十五年以前被視作極為敏感的主題。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主流民族志區域，任何一個有雄心的人類學系都不會輕易忽視。不過，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正如二三十年前研究港台時一樣，他們的影響範圍只是逐漸超越了研究中國的同行，在十年不到的時間，與中國相關的文章多少規律地出現在主流人類學雜誌上。從這點來看，人類學事實上相當落後於許多其他社會科學學科，比如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科學，人類學家的沾沾自喜常被指責為西方本族中心主義 (Western ethnocentrism)。

二 研究中國的人類學：邁向主流

研究中國的人類學雖然有全新的主流身份，卻顯然是不成熟的。主要體現在處理更為一般的而非中國特有的問題時那種明顯



的猶豫。另一方面，在其他民族志田野工作的人類學家依然幾乎從不敢到中國冒險，儘管有其他學科強調中國回歸主流的跡象。特別是現在的經濟學家，例行公事式地將中國包括在他們的研究項目中。雖說中國的材料還沒驅使著經濟學家努力建模或理論化，經濟學刊物的表格因有中國這一項而出眾已是不爭的事實。經濟學家（亦可稍微延伸到社會科學家）明顯擁有優於人類學家的多種條件。經濟學科在中國很紅，又有雄厚的資金支持。世界銀行與其他國際組織在中國理所當然地與經濟學家和政府合作，為經濟學家提供了相當的資金、資料、複本支援，這些都是人類學家求而難得的。相反，人類學在中國仍然是冷門。此外，多數人類學家依然獨自從事田野工作；學漢語對人類學家至關重要，且較之於經濟學家是更大的進入障礙。

總而言之，中國人類學正如中國本身一樣，在21世紀頭十年，依然將夾在民族志大國地位和民族志田野自足所帶來的一貫褊狹之間。這種狀況似乎並不會持續太久，人類學迅速成熟的主流身份確已有明顯跡象。除了研究者和期刊絕對數目的增長外，當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自己明顯大膽地探討他們的工作對超越理解中國本身的啟發時，越來越多研究其他地區的人類學家將中國列入了下一項目或行程。因此，如果這個世紀確實是中國的世紀，那麼她的人類學又將帶來什麼呢？

我們在此要指出的第一點觀察是，在寫中國的許多民族志作品中，有關改革的熟悉的權威論述依然可見。然而，像在其他社會科學中一樣，人類學家總體上現在已經超越了這樣的觀點，即計劃與市場之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是衝突的、不相容的。來自東歐和前蘇聯的術語“轉型 (transition)”和“後社會主義 (postsocialism)”，作為描繪中國計劃中的未來已經不常用，它們已被“晚期社會主義 (late socialism)”、“市場社會主義 (market socialism)”，或者用我的話來說“新社會主義 (neo-



socialism)”所取代。同時，人類學家現在也更傾向於明確地把政黨—國家 (party-state) 包含在他們的作品裏，將政黨-國家視作田野事實的內在組成，而不再像過去那樣將其描述為對民族志主體的外在衝擊。同時，人類學家也對如下現象的新形式保持著敏感：由市場資本主義與權威治理的共存所帶來的，剝削 (exploitation)、剝奪 (dispossession)、反抗和不平等，以及與之相反的富民 (enrichment)、賦權 (empowerment) 和特權。人類學家並不羞於承認自己不穩定的影響，但跟其他社會科學家比起來，不太傾向於將上述新現象歸結為體制轉型、共產主義的坍塌、民主的不可抗拒性，或者其他通常暗指西方現代性之獨特性和必然性的預定陳述。

第二，在近期有關中國的作品裏，“現代化 (modernization)”正逐漸取代“改革 (reform)”成為對現行狀況的主要表述。實際上，我們現在習慣於將“現代性 (modernity)”視作中國某些群體、階層或部分的既有狀態。人類學家已開始將研究轉向關注生活方式、消費模式、遷移策略、民族教宗關係的重組、教育、醫療和健康、權力構成及中國現代性的其他新近表現。對於改革在成功獲致現代性方面的認可，幾乎抑止了所有使用迫近的政治或社會“危機 (crisis)”的提法。取而代之，在談到中國時，媒體、政論和多數的主流學術界習慣用“歹勢 (threat)”⁹一詞。例外地使用危機一詞最近才顯著地浮現出來，這就是在環境方面。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並獨自地關注環境，然而，長期田野工作將人類學家放在了一個戰略性的位置上，即梳理有關污染、大壩施工、土地退化的本土意義，以及社會、政治和文化含義間的複雜聯繫。

除了這些中國特色 (China-specific) 問題和議題之外，中國作為主流民族志區域有望為人類學提供大批基礎性的新議題。正如我在本文開頭所述，中國是第一個從西方世界體系的邊緣轉變成



超級大國的，在政治、戰略、經濟、宗教和文化支配方面，是自身區域以及不斷增長的全球體系的核心。這對人類學家來說意味著，他們必須妥善地針對這樣一個遠不止是一種他文化的社會進行思考和寫作。

用這種全球視角來看中國文化對研究中國的人類學來說深有啟發。最顯而易見的一點是我們再也不能撇開整個中國來談任何有關中國的議題或地點。其中所包含的意義要超過弗里德曼的觀察：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應把中國看成一個複雜社會，例如可以通過離開鄉村而去城市做調查來實現。正像在中國的每個角落都會感到世界的影響一樣，甚至發生在中國最偏遠鄉村的事也會對全球有反作用。“中國”再也不止局限在這個國家的國境線之內。像艾君·阿帕德雷 (Arjun Appadurai) 指出的那樣，研究中國的人類學需要像她所研究的文化那樣將自身“去地域化 (deterritorialize)”¹⁰，以研究中國的人口、政治和城市化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

在我看來，發展如下這種“過程地理學 (process geography)”來研究中國，有兩個關鍵點需要指明。首先，我們的關注點要更明確地轉換，從關注社區本身轉到關注社區如何與它所根植的廣泛社會相聯繫。這樣做使得人類學長久以來容易遭受短視的攻擊，同時人類學研究也會暗中被其他社會科學家更無所不包的作品比下去。其實，社區和屬地 (belonging) 應被當成過程 (processes) 來看待，它們是歷史的並往往是相當偶然的建構物，由中國境內外一系列機構和行動者的活動所促成。換句話來說，研究中國的新人類學應該揭示出這個被建構為中國的實體的本性，搞清楚“中國”及其部分是怎樣在世界各不同區域和環境中被建構的。難點在於如何理解作為一部分並相互交織，同時又和其他地區以及一個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相分離。這個我稱為“中國全球化 (Chinese globalization)”的過程不僅包括商品、金錢、



觀念和人員的流動¹¹。中國的機構，包括國家、交易、銀行、志願聯盟、宗教組織、犯罪團夥等等，今天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深深聯繫，其方式即使在幾年前都是聞所未聞的。換句話來說，作為21世紀國際人類學的推動力量，研究中國的新人類學要想發揮實力，研究者要做的和50年前的那撥人完全相反：我們的先輩嘗試從港台農村提取出未受污染的中國文化精華，而我們現在卻關注全球與本土的混同 (creolization) 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文化迅速變成其中的主導成分。

在一個我於《社會人類學》版面發起的論辯中，彼得·凡·德威爾 (Peter van der Veer) 和王斯福 (Stephen Feuchtwang) 強調了，研究中國的新人類學在發展文明 (civilisation) 和文化比較進路方面對於國際人類學的貢獻。¹² 作為一個國際力量，中國自覺地利用自身卓著的文明成果 (civilisation)，希望能夠獨立於西方文明所有者 (civiliser) 而掌控自身的現代性。中國也並不猶豫於憑藉自身能力成為文明所有者，將自身的現代性投放到他者身上。中國對內部他者（少數民族、邊遠農村地區、國際移民以及不斷增加的國際移入民）的態度將是未來情況的首個指示器。在這種狀況下，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將發現自身處於一個不熟悉的位置。不再是給那些在西方力量主導的世界體系邊緣的非西方附屬者代言，中國的人類學家將從一個正在顯現的中心的優勢位置，以民族志的視角觀察支配、擴張和剝削等現象。像王斯福在辯論中指出的那樣，用文明化的視角 (civilisation perspective) 研究中國，我們特別要在自己的分析中納入長時段的中華文明史。¹³ 這裏，文明 (civilisation) 不能被理解為原始的反面，而應被理解為“文化 (culture)”的反面。這個意義下的文明化不僅僅是一種存在狀態，而是一種想要變得更好的渴望（不論“更好”怎麼理解），不論是單獨地，還是作為一個群體、一種文化或者一個民



族。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已經持續幾個世紀並將繼續是一個文明國度 (civilization)。人類學家弄清楚教化工程 (civilizing projects) 在中國本身及外部他者的持續和轉變，就可以將其與其他地方（例如，印度、歐洲、美國、伊斯蘭世界）的教化工程進行基於民族志的比較。¹⁴

這樣，中國人類學 (the anthropology of China) 不僅能在人類學自身內部促成一個明晰的比較社會學的復原，同時也使人類學家能夠參與有關世界後續力量崛起的大討論，這些討論主要還是基於少數的文化原型而非顧及民族志證據。依我看，讓我們的影響超越學科界限是中國人類學邁向主流的一個方面，與在學科內部獲得更加顯著的位置一樣重要。事實上，它甚至可以關係到人類學作為一個可靠研究領域的存亡問題。想要搞清楚構成中國文化特殊性的必要方面，持續產生了對概念去情境化的、一般化的約定的迫切需求，例如面子這一中國概念或中國家庭的共同特徵。我認為揭露這些危險的歸納，是人類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的一大主要任務。我們在這些主題上自然可以僅僅停留在思索層面，但我個人認為，如果熟知民族志的人類學家能即刻公開地參與到論辯中來，那麼，那些對東亞經濟潛力的大肆渲染或者對於迫近的文明衝突的警告，就不會再被如此當回事。

然而，人類學家這樣做之前必須完全自信是中國專家。隨著研究中國在其他領域的主流化趨勢，經濟學家、政治科學家、社會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已經開始佔據了一些人類學的觀點。遺憾的是，譬如有人想要瞭解農村社區的土地徵用，他會發現人類學的作品往往落後於經濟學、政治學或者地理學的作品好幾年。這本身並不必然是什麼嚴重的缺憾，人類學家可以彌補，只要發揮出闡釋和分析深度方面的傳統優勢以及新增優勢。人類學家繼續享有這一獨門絕技，即發掘應對國際進程和挑戰時高度特殊的



本土反應和行動，展示本土意義系統如何與政治的、社會的環境限制相周旋。當把這一優勢運用到分析長期文明化過程和比較社會學時，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為作品的滯後性辯護。

三人類學的全球化 (Globalising anthropology)

我在這裏一直討論的研究中國的人類學，故意只包括那些活躍於國際人類學界的人類學家，這其中大部分是那些田野基地在中國境外的人。談論世界特定一塊區域的人類學，卻不談在那裏生活和工作的人類學，這事兒聽起來奇怪，不過完全有可能，而實際上也是常有的事。如 Takami Kuwayami 所指出的那樣，人類學並不簡單是全球學者的團體，而是一個包含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世界體系。¹⁵ 這兒我想就 Kuwayami 的觀察再推進一步，在某些細節上仔細考察中國境內與境外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間的關係。

我從這一發現講起，雖然世界學術體系的不平等並未阻礙資訊和人員在中心與邊緣間的流動，卻從根本上抑制了國家或地區的專家跨越中心與邊緣之界限而形成分散的團體。我同意艾君·阿帕杜拉的觀點，他在前面引文中指出，上述現象是人類學（或任何其他社會科學）在全球擴展中的核心問題。¹⁶ 我認為，為了發展更加整合的全球人類學，中心和邊緣應該首先在區域研究團體中相互交流。換句話說，本土化 (localization)（或者中國人常用的 indiginisation \ nativisation）在朝向真正的學科全球化方向上是必要的步驟。來自中心的人類學家應與他們所研究地區的本土人類學家進行平等、持續的討論。那些本土人類學只有參與這些討論，才能最終在一般化的人類學辯論上有機會被接納為平等的對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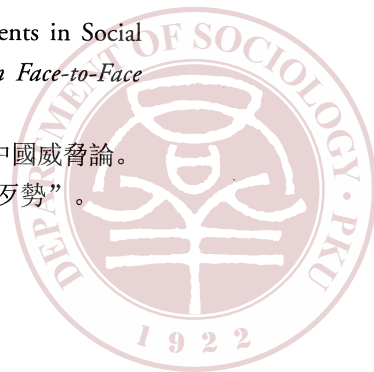
如我在前文指出的那樣，人類學田野雖然在中國進行了很多年，概念創新和辯論卻出奇地缺乏。依我看，這一問題最終可以也應該被克服，那要靠合作、辯論，以及不輕易苟同於研究中國的同事。要將我們自身移植到所研究的社會，除非創造出一個植根於那個社會的分散的人類學家團體。這種地方化 (localizing) 策略反過來會產生議題、論辯和觀點，其他人類學家可能從中得益或受啟發（只要他們激烈反對那些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簡言之，地方化 (localization) 同時也是一種通則化 (generalizing) 策略。最終，這種通則化會轉而成爲追求更大平等性的策略，並將使人類學有利於其所研究的國家和人民。

本土人類學家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爲此他們不能自滿地袖手旁觀，等著外籍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去發起討論。中國的人類學家必須直面這一事實，他們整體上對非中國籍人類學家來說是不引人的對話者，主要因爲他們缺少對其他文化的參與以及異域田野工作帶來的關鍵優勢。如果中國人類學渴望成爲既植根於又切合於國際學術發展的學科，那就不該僅僅關注中國及其內部他者——少數民族，在中國境外做田野也會超級重要。中國人類學要改變歐美或日本人類學主流外的邊緣支流地位，擴寬田野範圍、超越中國經驗的理論化也是前提條件。爲了在全球人類學團體中做個平等的參與者，而不再僅是有趣的原始材料和聰明的研究生的提供方，在中國的人類學家中需得產生論辯，這些辯論對於外籍或研究其他社會的人類學家來說是有關係的。本國化 (Indigenizing) 中國人類學也許可以促成這個目標。由於屬於一個活躍的本國團體，該團體包括本地和外國人類學家，在中國的人類學家會更加重視到並更廣泛地參與人類學論辯。最終，地方化策略會成爲促成我們學科平等全球化的最佳途徑。



注釋

- 1 本文系作者於2008年11月底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舉辦的“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和中國社會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詞。原文為英文，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08級研究生秦婷婷譯成中文。
- 2 Frank N. Pieke, “Beyond Orthodoxy: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ian Anthropology*. Jan van Bremen, Eyal Ben-Ari and Syed Farid Alatas. (London Routledge, 2005), 59–79.
- 3 譯者注：該文關於“中國（的）”和“人類學（家）”的意義組合比較複雜。仔細揣摩全文後，我對如下概念是這麼翻譯的：China Anthropology 研究中國的人類學，指以中國為民族志田野基地的人類學，包括本土人類學家和外國人類學家的工作。相應地，China Anthropologists 譯為研究中國的人類學家。International anthropology of China 中國的國際人類學，作者所指為外國學者從事的、研究中國的人類學。Chinese Anthropology 指中國學者從事的人類學。Chinese Anthropologist 為中國籍人類學家。Anthropology of China 籠統地翻譯為中國人類學。總體來看這些有點複雜的意義組合，China 主要指田野調查地點是“中國”，Chinese 主要指做田野的學者是“中國人”。
- 4 Maurice Freedman,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5 譯者注：不同的田野工作會帶來特殊的地方性問題，但人類學當然也有超越一般田野個案的、普遍的問題，這就是一般人類學問題。作者在這裏強調，人類學家研究中國時所得出的結論過分以來於特殊研究經驗，不具有一般性，因此影響力薄弱。作者著意批評了這種褊狹。
- 6 Richard, Fardon, Ed. *Localizing Strategies: Regional Traditions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Edinburgh and Washington, D.C.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and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0.
- 7 譯者注：英文原文 sociologist 使用斜體，作者意在強調，僅有的兩個人類學的一般概念，其中一個還是由社會家而非由人類學家的作品而推廣。
- 8 Erving Goffman, “On Face-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 In Erving Goffman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in Face-to-Face Behavior*.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5–45.
- 9 譯者注：threat 不應翻譯為“威脅”，不然很容易被誤解為中國威脅論。在文中它的意思是，比危機要輕的危害，因此勉強譯為“歹勢”。



- 10 Arjun Appadurai,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 *Public Culture*.12(1) (2000), 1–19.
- 11 Frank N. Pieke, Mette Thunø Pál Nyíri and Ceccagno Antonella *Transnational Chinese: 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2 Frank N. Pieke, Ed. "Anthrop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a". Special issu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19(1) (2009).
- 13 Stephan Feuchtwang, "India and China as Spiritual Nations: A Comparative Anthropology of Histories." *Social Anthropology* 19(1) (2009).
- 14 譯者注：這段翻譯幸得白小瑜師姐批評指正，尤其是 civilizing projects 一詞，苦思不得解，譯為“教化工程”則豁然開朗，在此聊表謝意。
- 15 Takami Kuwayama, "The 'World System' of Anthropology: Japan and Asia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of Anthropologists". Shinji Yamashita, Joseph Bosco and J.S. Ead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35–56.
- 16 Arjun Appadurai,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 *Public Culture* 12(1) (2000), 1–19.

